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研究

南艾彤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域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有助于把握其理论生成逻辑、历史演进脉络与现实阐释方式。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逐步实现中国化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讨论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功能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植根与发展

(一)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构成理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并逐步取得影响,并非单纯因为其理论,而是因为它为近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它不仅提供了分析社会结构和历史动力的工具,也为重新理解国家命运、阶级关系与社会变革开辟了新的认识。可以说,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前提。更重要的是,这种接受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理论不是为了纯粹解释而被引入,而是为了回应国家向何处去、社会如何重建、人民如何摆脱困境等根本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吸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逐步形成影响,主要是因为它回应了近代中国最核心的时代问题。与当时一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历史动力的

层面分析社会矛盾,这种解释使知识分子能够超越表层现象,尝试把中国问题放到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中重新理解。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这种能够把理论层面的意义提升到实践层面加以探讨的理论,无疑具有明显的思想吸引力。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首先在于它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历史条件中发展自身”的基本逻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体系,而是在不断回应时代问题、吸收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开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体现了这一发展规律,理论不能停留于原初形态,而必须通过现实问题的分析、经验的积累与实践的检验,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持续发生影响,关键不在于复刻经典理论,而在于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中不断丰富。回顾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它是在吸收欧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传播和发展,也始终伴随着对本土历史经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现代文明成果的吸纳与转化。因此,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能只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也应看到它在长期发展中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现代治理经验以及全球发展议题的综合回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当代表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关于发展、改革、治理、文化、社会、生态和世界关系的论述共同构成的理论系统。其重要特点在于,它始终把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生成的起点,把实践作为理论检验的重要场域,把历史经验总结作为理论完善的重要方式。因此,这一理论体系既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具有持续扩展的可能性。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意义

(一)对现代化道路研究的理论拓展。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现代化道路、治理体系、发展方式与文明形态等方面形成了更为系统的讨论。这些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再仅仅围绕经济或制度展开,而是把现代化理解为涵盖现代化发展、生态关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综合过程。这样的理解方式,使现代化研究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也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提供了新的经验材料。现代化在这里不再只是“追赶”的同义语而是被理解为一个兼顾历史条件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当代中国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如何实现协调发展、如何处理市场机制与公共治理关系、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发展自主性等问

题。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研究中的当代内涵。

(二)对人类发展议题的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的解放、社会公平与共同发展等根本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生态压力加剧、社会风险增多等,呈现出复杂的结构。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共同富裕、绿色发展、数字治理、公共服务均衡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上的讨论,正是在回应这些新的历史挑战。这些论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提出目标,更在于将发展重新放回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结构中加以理解。

参考文献:

[1]黄三生.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研究”评析[J].文化软实力,2022,7(04):65-73.

[2]郭向阔.两种历史视域下的毛泽东和“中国道路”比较研究[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3(02):30-33.

[3]刘艳房,果强.“六个必须坚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大党形象建设[J].廉政文化研究,2024,15(05):36-45+2.

[4]刘建军,苗润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J].前沿,2025(06):1-9.

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风险识别与治理路径

尚晨光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以迅疾的发展态势与深广的渗透力度推动着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变革。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指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这一重要论述为审视智能时代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在极大丰富教学资源供给与创新知识呈现方式的同时,也将技术自身的内生风险悄然带入课程运行全过程。应该深入剖析智能技术介入思政教育的深层风险机理,精准构建系统有效的治理路径,使人工智能真正转化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可信助力。

一、技术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重重风险

从知识论层面来看,思政课旨在进行价值引领与信仰塑造,其教学过程传递的核心是一种“信念性知识”。这类知识的说服力不仅来自透彻的学理逻辑,更有助于主体的内心认同与情感确信。正如知识社会学者马克斯·舍勒在区分知识类型时所指出的,关乎价值与意义的知识不同于纯粹实证性的客观知识,它的接受必须依托个体的情感投入与价值确信。这种知识属性决定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师生间的信任结构,所谓“亲其师,信其道”,知识的接受与权威的信任往往密不可分。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正在悄然重塑这一深层结构。面对复杂的理论议题与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学生习惯于向算法寻求即时解答,而非与教师展开深度的思想交锋。当课堂讨论的参考坐标逐渐从教材的经典论述转向大模型的即时生成,知识的权威来源正从教师与教材构筑的制度性权威,日益让位于算法与概率编织的技术性权威。这种重构的隐蔽性,在于大模型输出的语言往往流畅自信且逻辑自洽,极易制造出一种形式合理的假象。语言越是流畅,其内嵌的价值预设就越难以辨识,回答越是完美,学生就越容易放弃独立追问。这比明显的错误言论更具渗透性,因为它不是以谬误的面目出现,而是以正确的姿态完成了对主流价值的稀释与偏移。由此,深层的挑战并非人工智能输出了何种错误内容,而是课堂赖以运转的信任

结构正被悄然改写。当学生将信念的确认权让渡给算法,“信其道”的根基便随之动摇。

在关系论层面,思政课的育人过程高度依赖师生间具身性在场的情感共振与人格感召。教师在教学互动中的语气、神态乃至整体的精神风貌,往往承载着大量“默会知识”。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指出,这类隐性认知高度依赖个体经验与身体实践,是一种嵌入在具体教育情境中、通过师生互动中的语气、神态、精神风貌等细微表现得以传递的实践智慧。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技术中介的泛在化应用,正促使传统的师生交往模式经历一种“去情境化”的剥离,即从具体的、身体在场的情境中逐渐抽离。这种改变的深层隐忧,不在于教师教学投入的减少,而在于师生间原本基于心灵对话的价值引领,有可能退化为单向度的信息接收。长此以往,技术逻辑对教育场域的过度介入,将导致教学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人”的因素被边缘化。当充满温度的生命交往被降格为机械的数据交互,价值引领便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情感锚点,思政课在关系维度的育人功能也随之面临被实质性悬置的风险。

在主体论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代理功能,正隐蔽地剥夺着学生独立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正如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在论述技术“外在化”时所揭示的,当人类的记忆与认知技能被外置到技术客体中时,主体便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在“技艺”(savoir-faire)与理论化能力的丧失。当学生习惯于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作业、撰写心得、回应思辨性问题时,被外包出去的不仅是信息检索的劳动,更是价值判断的思维过程本身。这种对认知捷径的依赖,在一般知识性课程中或许仅表现为学习效率的异化,但在思政课中却构成了对育人目标的本体性消解。思政课的教学旨归,恰恰不在于让学生简单地知晓正确答案,而在于引导其完整经历得出答案的思想斗争。信仰的生成必须经过个体内心的价值冲突、理性审视与思想淬炼,无法通过算法投喂的现成结论一蹴而就。因此,面对智能技术的认知代劳,思政课必须坚守其作为“思想淬炼场”的属性,在技术理性的包围中,捍卫学生作为价值建构主体的独立地位。

二、技术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治理路径

一是建设自主可控的知识供给体系,夯实思政课堂的信任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落实到思政课教学,关键不是将技术拒之门外,而是把内容生成的定义权与把关权牢牢掌握在教育者手中,使智能技术始终沿着立德树人的正确方向运行。在宏观技术架构层面,应积极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2026年4月印发的《“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分阶段研发内嵌主流价值导向的思政教育专用大模型,通过强化算法的价值对齐能力,从源头矫正通用模型先天的价值偏差。在中观资源建设层面,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需牵头构建经过严格政治审核的思政课专用语料库,将权威教材、经典文献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结构化入库,使智能输出言之有据、言之有源。在微观教学应用层面,则需建立生成内容进课堂的常态化审核机制,明确教师对拟采用人工智能内容的政治把关责任,确保任何技术生成物在转化为教学内容前,均经过严密的价值审视与学校校验。更进一步,教师还可以化被动把关为主动运用,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引入课堂开展辨析式教学,引导学生剖析其中的立场预设与话语偏向,把技术的价值风险转化为培养学生政治鉴别力的鲜活教材。

二是优化技术介入的方式边界,守护思政课堂的具身场域。需将治理关口前移,从输出端的内容审查转向设计端的交互引导。当前通用大模型默认扮演有问必答的答案供给者,是将复杂价值体认简化为信息即时交付的底层逻辑,实质上悬置了知识建构的探究过程。破解的关键在于调整教学场景中的人工智能角色,将其由单向输出的回答者转变为启发思考的诤问者。这一设定的教育学意蕴在于,通过阻断直接的答案供给,迫使学生在信息加工中投入高阶认知努力,以思维的“摩擦力”唤醒学生的探究自觉。高校在部署教育大模型时,可通过系统提示词工程将苏格拉底式对话设为默认配置,引导系统以反问和追问替代直接结论,从而在技术设计层面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在制度保障层面,教学管理应引入节奏治理理念,通过刚性制度为“慢变量”划定保护区。师生信任的建立、价值信仰的生成属于教育过程中的“慢变量”,极易受到智能技术“快变量”的挤压。具体而言,需将师生深度谈心、无终端研讨以及教师随堂答疑等核心环节固化为不可替代的教学规范,明确不以技术手段

替代以物理空间的在场与时间维度的沉淀,守住思政教育的人格感召力。

三是推行过程透明的评价变革,重塑学生思维在场的主体地位。认知外包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以结论为中心的传统考核模式为“标准答案”留下了可乘之隙。需超越与技术捉迷藏式的末端防堵,转而将人机交互过程由隐性状态推向显性评价。在具体路径上,首要之举是调整评价重心,大幅压缩结论性与复述性考核的比重,转而强化课堂辩论、口头答辩及情境研讨等必须依赖学生即时思维参与的过程性考核。此外,建立全周期的作业留痕机制。高校可推行“独立初稿、人机对话记录、批判性修订稿”三件套并行的作业范式,促使教师的评价焦点从单一的文本产出,转向审视学生的提问策略、对技术生成内容的批判性考量以及修订过程中的价值坚守。这一机制的意义在于,它使思政教育中原本不可见的思想斗争于价值体认过程,首次具备了可观察、可评价的制度形态。最终,学生的批判性技术素养并非源于理论宣讲,而是在这种留痕、对勘与辩驳的日常规训中自然生成,进而实现从被动索取答案向主动与技术辩难的主体性跃升。

应该看到,智能技术的演进浪潮不可逆转,直面并化解内生风险恰是深化教育变革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一理念为思政课教学指明了方向,其核心要始终聚焦于教育对象——具备完整精神世界的“人”。算法虽能加速知识检索与重组,却无法替代价值认同生成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共鸣。因此,智能时代思政课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应用之“术”,更在于守护人的主体性之“道”。教育者需以清醒的价值自觉为技术划定边界,用深厚的理论功底引导学生穿透信息迷雾、触及思想本质。唯有如此,思政课方能在技术洪流中坚守精神坐标,让每一次课堂成为培育灵魂、滋养生命的真实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4JDSZK143)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